

一册在手，当代经济学主流思潮尽在掌握
透过无形之手，看穿供给与需求的奥秘



何谓大师？

——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成就

吴惠林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何谓大师？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成就

吴惠林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10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谓大师?: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成就/吴惠林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ISBN 978-7-100-07539-8

I. ①何… II. ①吴… III. ①诺贝尔奖金—经济学家
—思想评论—世界 IV. ①F0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3680 号

本书由(台湾)博雅书屋有限公司授权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大陆
出版发行简体字版本。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何谓大师?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成就

吴惠林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广 西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07539-8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0 年 12 月广西第 1 次印刷 印张 14 1/2

定价:35.00 元

目 录

序言	1
1969 计量经济学始祖——弗里希和丁伯根	15
1970 才华洋溢的萨缪尔森	27
1971 国民收入之父——库兹涅茨	41
1972 一般均衡理论的佼佼者——希克斯和阿罗	51
1973 I-O 分析法的先驱者——里昂惕夫	61
1974 鲜明左派与强硬右派——缪尔达尔和哈耶克	69
1975 规范经济学理论的豪士——康托罗维奇和库普曼斯	85
1976 二十世纪唯一的一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	95
1977 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经济政策的创始人——俄林和 米德	107
1978 富有创新精神的通才——西蒙	115
1979 一代学儒舒尔茨和黑人表率刘易斯	121
1980 经济预测的泰斗——克莱因	131
1981 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托宾	143
1982 幽默的经济学布道家——施蒂格勒	155
1983 用词精准的分析家——德布鲁	163
1984 国民经济核算之父——理查德·斯通	173
1985 王冠上的宝石——莫迪利安尼	183

1986	布坎南以及公共选择学说·····	193
1987	葡萄园里的智者——索洛·····	211
1988	胸罗万机——阿莱斯·····	219
1989	排拒诺贝尔奖的隐士——哈维默·····	227
1990	金融经济学的翘楚——马克维茨、夏普和米勒·····	235
1991	排斥“黑板经济学”的学者——科斯·····	247
1992	扩展经济学应用领域的奇才——贝克尔·····	257
1993	新经济史学家扬眉吐气——福格尔和诺斯·····	267
1994	非合作博弈论的拓荒者——纳什、海萨尼和泽尔腾·····	277
1995	理性预期旋风来也——卢卡斯·····	287
1996	信息不对称的后继——维克瑞和莫里斯·····	295
1997	金融工程科技开创者——默顿、斯科尔斯·····	305
1998	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森·····	313
1999	供给学派的开山祖师——蒙代尔·····	323
2000	微观计量经济的实践者——赫克曼和麦克法登·····	331
2001	信息不对称市场理论的奠基者——阿克洛夫、斯宾塞和 斯蒂格利茨·····	341
2002	理性与自利的挑战者——卡尼曼和史密斯·····	357
2003	与台湾学界渊源颇深的大师——恩格尔和格兰杰·····	367
2004	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巨擘——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	375
2005	非合作博弈论的倡导者——奥曼和谢林·····	385
2006	现代宏观经济关键人物——费尔普斯·····	395
2007	机制设计理论的舵手——赫维奇、马斯金和迈尔森·····	405
2008	新凯恩斯学派代表——克鲁格曼·····	421
2009	经济治理的专家——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	435

序 言

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师群英谱

十月是“光辉灿烂”的，因为节日庆典特别多，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对于全球学界而言，十月的共同盼望则是炫耀夺目的“诺贝尔奖”得主揭晓，这是自 1901 年以来就有的习俗。诺贝尔奖是依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 1833—1896)的遗嘱设定的，由于金额庞大以及评审过程严谨，此桂冠一直是最被世人看重、最崇高的荣誉。

诺贝尔奖的由来

诺贝尔为何要出资设立此奖？据丹尼尔·尤金(Daniel Yergin)在 1991 年出版的巨著《石油世纪》(*The Prize*)中记载，诺贝尔家族是石油大亨，发明火药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在化学和财务上都天赋异禀，利用硝化甘油在 19 世纪建立了一个从巴黎操控全局的火药帝国，没想到却被野心家用作杀人利器，而且火药也使战争更为残酷，死伤者更众，因而发明火药的诺贝尔备受谴责。

就在 1888 年，阿尔弗雷德的二哥路德维希(Ludwig Nobel, 1831—1888)在法国度假时，因心脏病突发逝世，有些欧洲报纸把诺贝尔兄弟搞混，误将路德维希当成阿尔弗雷德，于是阿尔弗雷德读到自己的讣闻，也发现报纸把他称作“火药大王”，盖棺论定他是凭发现新杀人方法

致富的“死亡贩子”(或谓刽子手)。阿尔弗雷德目睹此景颇感悲痛,也因而惭愧、省思,终于改写遗嘱,捐赠一大笔款项成立“诺贝尔奖”。

依诺贝尔遗嘱所设立的奖项,原先只有物理、化学、医学、文学以及和平奖等五种,诺贝尔希望奖励的是特殊“成就”,并非杰出的个人。因此,在自然科学方面,诺贝尔奖是针对重大“发现”(discovery)、“发明”(invention)以及“改善”(improvement)来颁发的。

经济学奖的出现

经由简单的叙述之后,我们已经知道诺贝尔奖的设立,是诺贝尔为了赎其发明火药以致成为可怕的杀人利器之罪而拨款成立,但获颁诺贝尔奖者无疑被世人极度另眼相待,被尊崇、被羡慕稀松平常,而历年来的得奖者也大都认为得奖是其一生至高荣誉。既然诺贝尔的遗嘱里只设物理、化学、医学、文学以及和平奖,现今每年颁发的经济学奖当然是后人新设的。

原来它是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成立 300 周年,在 1968 年出资创设的“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简称“诺贝尔经济学奖”,于 1969 年开始颁发。此一新设的奖项,基本上给奖标准是比照原先的五种,依瑞典中央银行的规定,该奖项每年颁发给一位在经济学上有杰出贡献,且其重要性一如诺贝尔在遗嘱中所言的人士。不过,有许多次,当年的得奖者不止一位。而尽管诺贝尔原先希望奖励特殊的成就,而不是杰出的个人,但不可否认的是,成就是附着在人身上,终究似乎反客为主,世人反而较在乎得奖人。

虽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诺贝尔本人所设立,但其被世人重视的程度一如原始的五种奖项,尤其在经济学界更被视为最高荣誉。可是自该奖诞生以来,“异声”似乎未曾间断,最大的反对声浪是认为,经济

学奖不应与其他奖项一起颁发,因其非诺贝尔本意,意义显然不同。这种反对意见并无实质内涵,只具“形式”意义而已。比较有力的反对意见,乃认为经济学并非“科学”,连经济学界都有人这么主张。有趣的是,最具代表的人物却是 1974 年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瑞典的左派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

缪尔达尔在接受了诺贝尔奖之后,愈想愈不妥,于是撰写一系列文章谴责此一奖项,也对自己曾经受奖表示遗憾(只不知他是否将高额奖金退还给主办单位)。他表示,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和物理学、化学或医学有着相同意义的科学。关于这一点,相信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是不同意的,其中,197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 197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称为经济学界鳗鱼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的反驳最具代表性。

经济学是否为科学

弗里德曼 1985 年 3 月 21 日应美国得州三一大学(Trinity University)讲述其走上经济学术的心路历程,在表明其怀疑“诺贝尔奖是否有什么正面效果”时,特别就缪尔达尔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攻击提出驳斥。弗里德曼说经济学家既是社会的一员,也是科学家,他们并没有把百分之百的生命投注在纯科学工作上,但物理学家或化学家也一样。

基本上,经济学所具有的科学成分,和物理学、化学或其他自然科学的科学成分,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虽然物理学家可以在受到控制的实验室操作,而经济学家则不能,但是光凭这一点,仍不足以否认经济学的科学性。举例来说,大气科学是一门公认的科学,但几乎是不可能进行控制实验,在许多其他的科学领域也都有类似的限制。经济学家固然不太可能执行控制实验(有些甚至是可能的,也已经在做

了)，但是未控制的经验，经常会产生近似控制实验的资料。

弗里德曼举统合前的东、西德为例，比较不同的经济制度，认为这是控制实验的优良例子。这两个国家以前是一个国家，人民背景、文化、遗传基因皆相同，但却因为意外的战争而分裂为两部分。在柏林围墙的一边是相对自由的经济体制，而另一边则是集体主义的社会。

弗里德曼进一步认为，所谓的控制实验，也并非可以百分之百控制。两种不同的状况之间，可能存在着无数的差异，想要完全掌握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不相信所谓的控制实验与未控制实验之间在原理上存有任何差异；同样地，不论是在物理学还是在经济学的领域，进行科学工作的可能性，也应该是不分轩輊的。我们有必要清楚区分一个人在科学研究领域所做的事和他身为一个公民所做的事。这样的观念，在物理领域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学。

弗里德曼再以“星球大战”计划这个热门的争辩议题为例，指出有些物理学家声明反对“星球大战”计划，但却有另一批物理学家支持这项计划。很明显，这些不同的声明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已获大家认同的科学知识，绝大部分反而是这些物理学家的个人价值观，以及对政治事件的判断等。要评量他们在科学上的能力或贡献，凭借的不该是这些声明，而应该是他们在科学上的工作。弗里德曼强调，这种做法也适用于经济学。

其实，弗里德曼认定经济学是一种“实证科学”，早在1974年左右，一篇“芝加哥学派”文章已强调，而且将之列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第一种特色。弗里德曼说，经济学之为一种实证科学，是经由应用、检验、改进这三个过程，不断地循环而成，是典型的实证科学。弗里德曼之所以强调这一个特点，尚有两个重要理由：一是此系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重大差别所在；第二个理由是因为经济学能够成为实证科学，乃使

其在社会科学中享有后冠,也才使经济学在1969年开始,被列为诺贝尔奖的颁授对象,因为唯有能够实证,才可拿出证据来赞同或反对某些政策,也才使经济学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关系。

讲到这里,我的脑海里自然地浮现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当代重要人物,他是1991年11月去世的施蒂格勒(G. J. Stigler)教授,他也是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推手

如果说经济学家被诺贝尔奖评审委员所青睐,缘于经济学是门实证科学的话,那么,施蒂格勒教授在1964年第77届美国经济学会(AEA)年会的会长演说词——《经济学家和国家》(The Economist and the State)就贡献非凡了。

该篇演说对于经济学家未能就政府的公共政策做有用的实证研究,极表不满和不解。当时,施蒂格勒说:“两百多年来,国家的经济角色一直受到学者的注意,但却未引起他们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决心。我相信,在欧洲大陆和英美的文献中,终年不断的辩论总脱离不了抽象的谈论范围。经济学家既不想弃问题于不顾,也不想真正加以探究。”接着,他提出几个疑问:“为什么坊间有关如何评估资产的文献汗牛充栋,却没人就管制团体对价格和费率的影响做出评估?为什么指责侵犯个人自由的言论声浪震天,却没人积极探讨各项福利措施对所得分配之影响?为什么我们一直甘于让政策问题留白?”在提出这些疑问之后,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要求:“我们需要一套有关政府行动的正式理论,或是一系列关于政府和私人控制经济活动之比较利益的实证研究。”

施蒂格勒特别重视政府的公共政策,是因为公共政策的影响层面最深、最广,而想要政府能够制定完善的公共政策,唯有以证据显示公

共政策的影响效果,在“拿出证据”之后才能大声说话,也才可以避免受特权、利益团体的左右。因此,实证研究显得特别重要,而在当时,许多数量分析的新技巧已经出现,施蒂格勒兴奋地比喻说:“数量分析的新技巧之威力,就像是用先进的大炮代替了传统的弓箭手。”他更进一步地指称:“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科学革命,事实上,我认为所谓的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杰文斯(W. S. Jevons, 1835—1882)或凯恩斯(J. M. Keynes, 1883—1946)的理论革命,比起势力愈来愈强大的数量化牵连之广,只能算是小改革罢了。我认为,经济学终于要踏进黄金时代的门槛,不!我们已经一脚踏进门内了。”由于有此体认,施蒂格勒在该演说的末了说:“我对于我们这一门学问的光明远景感到无限欣慰。……过去半个世纪的经济学,证明我们的数量研究,无论在影响力、在小心翼翼的程度或在尝试的勇气上,都大大地增加了。日渐扩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将无可避免地、无可抗拒地进入公共政策的领域,并且,我们将发展出一套制定明智政策所不可或缺的知识体系。尔后,我相当明白地希望,我们将会变成民主社会的中坚人物和经济政策的意见领袖。”

其实,在施蒂格勒此篇大力呼吁重视实证工作的重要著作之前,他便已经以身作则率先从事有关“电力管制和证券市场管制”的先锋式实证研究,也由于亲身体验到“拿出证据来”的重要性,才有感而发地发表该篇大作。事隔五年之后的1969年,诺贝尔奖首次颁给经济学家,而得奖的就是两位著名的“计量经济专家”——弗里希(R. Frisch, 1895—1973)和丁伯根(J. Tinbergen, 1903—1994)。由这个事实,也可印证实证经济学是何等被看重了。即使到晚近,年轻一代的芝加哥学派健将、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赫克曼(J. Heckman)更是坚信“将经济学置于可供实证的基础上……如此一来,经济学可能会

有所进展”。

实证经济学是争论关键

因此,尽管芝加哥学派始祖奈特(F. Knight, 1885—1972)不认同将经济学发展为一门实证科学,弗里德曼却将实证经济学列为芝加哥学派的第一项特色,并特别强调它,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关于经济学是不是科学的议题,已故的蒋硕杰院士在《诺贝尔经济奖论文集》的序文《经济学为人类智慧结晶》中,也持非常肯定的看法,强调“经济学究竟是一门历史较短的科学,而且是非常难得实证的科学”。也提到自然科学家们讥评经济学不科学并不公允,他进一步认为,经济学是人类智慧的高度结晶,值得最聪明的人去研究它。由蒋先生的字里行间,依稀嗅出他对诺贝尔奖颁予经济学以拉拔经济学家的地位,持高度肯定。

由上文所提,中外诸大师的说辞,已可驳倒缪尔达尔等认为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论调,因而以经济学非科学,并不够格加入诺贝尔奖行列的说法也不能服人,而且也不是关键所在。事实上,正因为经济学在萨缪尔森等人的带动下,不断引入自然科学的分析法,以及在凯恩斯的带领下,经济学家成为影响国计民生公共政策的重要参与者,本来就已具相当重要性的经济学家,再以如此崇高的诺贝尔奖桂冠加在头上,是否会让仍为凡人的经济学家过分膨胀,以致提出错误的政策而荼害广大民众?就这一点应该才是思考诺贝尔经济学奖价值的关键。说也真巧,与缪尔达尔同时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耶克,就曾针对此关键点发表震聋发聩的演说。

哈耶克的传世谗言

如上所言,原本是希望奖励特殊成就的诺贝尔奖,已反客为主成为

褒扬得奖“人”，因此，对于有幸获奖者，其身价“暴增”，世人也往往认为他们高人一等，甚至是无所不能，这在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的得奖者身上更是明显。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容易理解哈耶克在诺贝尔奖受奖宴会上会这样说：

诺贝尔经济学奖既已设立，被选为联合得奖者之一的人，当然会深深感激；而经济学家们当然也对瑞典中央银行如此重视他们的学科，以致授予这项最高荣誉，而同样感激。但是，我必须承认，如果当初被问到是否要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我会断然反对。第一个理由，我怕这样的奖会像某些庞大的科学基金活动一样，势将助长时髦的学风。这个忧虑，现在由于我这样一个不合时潮的经济学者居然被选为得奖人而消失。可是，我的第二个忧虑，仍无法同样的释然于怀。

诺贝尔奖给某一个人的这种权威，就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讲，谁也不应该享有。在自然科学部门，这没有问题。自然科学家当中某一个人所发生的影响，主要是影响到他的同行专家们；如果一个人的业绩落伍了，同行的专家们马上就会轻视他。

但是，经济学家的影响之关系重大者，却是影响一些外行人：政客、记者、公务员和一般大众。

在经济学方面有了一点特殊贡献的人，没有理由就成为全能者，而可以处理所有的社会问题。可是新闻界却如此看待他，而他自己也终于自信是如此。甚至有人被捧昏了头，居然对一些他素未专研的问题表示意见，而认为这是他的社会责任。

用这样隆重的仪式以宣扬少数几位经济学家的成就，使举世瞩目，因而加强他的影响力，这样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想建议，凡是获得诺贝尔奖这项荣誉的人，必得做一谦

虚的宣誓，誓不在自己的学力以外对于公共事务表示意见。

或者，授奖人在授奖时至少要受奖者谨记住我们经济学的大师之一——马歇尔(A. Marshall, 1842—1924)的一句严正忠告：“社会科学家必须戒惧赫赫之名：当众人捧捧特捧之时，灾祸亦将随之。”

在这段话中，哈耶克的两点忧虑，一是担心诺贝尔奖将助长时髦学风；二是经济学者影响层面甚广，谁都不应有资格获得“权威”的标签，否则由于得奖之后所引发的膨胀，势将有害于社会。哈耶克本人因其在不合时潮时获奖，故免去了第一点忧虑，但由历年来得奖者的研究领域来看，却仍然存在，尤其曾有几年相继密集地颁给热门时髦的财务金融学者，更可证实哈耶克的忧虑。当然，我们并非否定该学门的价值，只是质疑诺贝尔奖锦上添花，甚至推波助澜的必要性。

至于第二点忧虑，一直以来都存在，因为绝大多数的得奖者都只是在各自专业领域内学有专精，较偏于“技术”和“工具”层面的专家，的确令人担心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存在，使经济学脱离“人文”层面愈来愈远。而且正如上文所提蒋硕杰院士所言，经济学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关系着国计民生极其重要的一门科学，但若误用而导致实施错误经济政策，则遗害将既深且远，最明显的是着重短期而赋予政府庞大“权力”的凯恩斯理论。可是，为何迄今该理论仍然甚为风行？主因之一是，太多人早年身受其教，已在脑中根深蒂固，纵使有心去除，当事人也已无力，再加上诺贝尔奖对经济实证科学的肯定，更使对新一代的教育无法还原经济学本质，甚至陷于如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J. Buchanan)严厉批评的“现代经济学缺乏一个扎扎实实的哲学基础，因而无法使经济理论与我们的人生发生适切关联”。

真正的经济学家

有趣的是，主张经济学是实证科学的人认为唯有抽离主观因素，将实证知识资源由臆测中分离出来，才能免于流为空谈或政治的偏误，也才能与实际人生连结。而持反对经济学实证科学论点、主张回归人文精神者也同样强调经济学应切合实际人生。为何目标相同，但观点却南辕北辙？由已故的自由经济学前辈夏道平先生对经济学家的分类，可得知梗概。

夏先生依循哈耶克的分法加上第三类，而将通常被称为经济学家的一群人，就其思想言论的底蕴分成三类：一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二是经济工程师，三是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他说这三种人都同样在使用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术语和某些模型，外行人看到他们发表的文章都讨论经济问题，很自然地把他们统称为经济学家，但实则有显著区别。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顾名思义大多是受雇于某人或某一集团，而为某人或某一集团的经济利益辩护，或者只是为捍卫他自身的利益。

经济工程师是怎样的人？工程师而冠以“经济”二字，我们可想到：他的专业是把公共经济事务的处理当作一项工程。他无视，至少轻视公共经济事务是千千万万的行为人、形形色种的主观意志表象。个人的主观意志，毕竟不同于既定的、客观的存在和可以规格化的物料。工程师的专业是利用工程学的知识，就这些物料预先做成一个模型（或出于自己的创意或遵照业主的愿望），然后按这个模型来建造一座壮观的庙堂，或一套精密的机器，或一条高速公路。由于所建造的东西不同，而有建筑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土木工程师这些不同的称谓，称谓尽管不同，他们同样地都是利用一些无生命、无意志的物料，制作预先设计好的东西，至于被冠以“经济”二字的经济工程师，则是搬弄一些经济学名词，而以工程师的心态、工程师的技巧，来处理人的行为所形成之公

共经济事务。

至于真正的经济学家,起码应有以下的认知:必须了解其所关心的“人”与生物学或动物学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样。经济学家虽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动物的欲望、冲动和本能的反应。但更重要的是,“人”还具有异于禽兽的意志、理念和逻辑思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大特征。人的欲望会自我繁殖不断增多,而其满足却要受到外在种种限制。于是在要求满足的过程中,他不得不有所选择。选择,是出于不得已;选择什么,则又力求自由。这就是说:人,并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争取自由的本能。

分工合作 和谐互动

由于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征,所以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渐渐学习了争取个人自由的适当方法。这个方法是要不妨害别人也能争取,否则终会妨害到自己的自由。只有“人”才会在个别自觉的互动中,形成分工合作而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同于出自本能的蜂蚁社会。人类社会的形成与扩大,是由于人的自觉行为之互动。“互动”之“互”字,显示出主词的“人”是指多数,而且多到说不出他们是谁;并非少许几个人,更不是像孟轲所称为“独夫”那样的一个人。其互动也是在其独特的环境,各凭独特的零碎知识而行为,而互动,绝不是靠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设计、规划、指挥或命令而组织成的所谓“团队”行为。

那么,非团队行为的行为,不正是有些人所说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吗?事实上完全相反。因为团队行为受制于这个团队主宰者个人的知识,即令他有所谓“智囊团”的帮助,也只是有限的少数人。至于分散在社会上无数个人的知识,个别看来是零碎的、琐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当然不能与任何专家系统智识同日而语。但是,那些分散在社会的知

识总和，却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知识所能摄取其万一。即令在将来更高科技时代的电脑，也不能纳入那些知识的总和。所以非团队行为不仅未造成混乱，反而是分工合作的社会所赖以达成、扩大的基础。如果引用亚当·斯密(A. Smith, 1723—1790)的话，这是“无形之手”的作用；引用哈耶克的话，则是“长成的社会秩序”。

重视“无形之手”，并不意味排斥“有形之手”；尊重“长成的社会秩序”，并不意含排斥“法制的社会秩序”。以“重视”、“尊重”这样的字眼，强调有形之手不应牵制或阻碍“无形之手”的运作，只能为其除去障碍，使其运作顺畅无阻；是要强调法制的社会秩序不应干扰或扰乱长成的社会秩序，只要提供一个有利于后者，得以保持活力而无僵化之虞的架构。

这些论点应用到经济领域，便是自由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由市场是长成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政府就是法制社会秩序之建立者。政府对于市场的运作只可维护或给予便利，不得有所干扰或阻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分类

在这三种分类下，夏道平先生曾就迄 1988 年 26 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评论说，并非全都是真正的经济学家，甚至就他们的思路来说，有的只可称为顶尖级经济工程师，当然这些得主应不至于是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

个人认同夏道平先生的说法，也不否认这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各专业领域的佼佼者，只是觉得诺贝尔奖的性质应该是非常特殊的，在经济学层面更宜朝“思想”上具原创性贡献者给奖，也并非每年都颁发不可，否则会拉低此奖的价值，甚至与其他一般奖项的地位相同，